

论文 NO. 2018 年 1

发表时间：2018 年 1 月 10 日

# 中国经济大转型：传统结构主义终结与 经济结构服务化的组织取向

袁富华 张平

摘要：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发生，标志着依赖初级要素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结束。在城市化逐渐成为增长主导力量，且全球化影响日益加深的历史背景下，增强制度组织弹性以保证效率改善和应对外部冲击，是大转型顺利推进的关键。国际经验对比显示，工业化向城市化的大转型，本质上受到创新能力和经济组织两种门槛效应的制约，重塑经济组织弹性以实现增长的内生性和效益的内部化，是应对各种困难的根本支点。

声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论文发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如需引用，请注明来源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论文》。

## 一、引言

两大增长背景预示着中国传统结构主义工业化路径的终结：一是国内城市化的稳步发展，使其接替工业化成为增长主导力量；二是面对全球化制度组织和技术力量的冲击，中国必须塑造经济组织弹性以应对冲击风险。对于发展阶段向发达阶段跃迁的转型过程而言，以资源动员机制变革为主线的效率模式重塑，是实现增长跨越的垫脚石，“全有全无法则”成为转型成败的试金石——亦即，转型存在制度和效率门槛。

中国传统结构主义工业化方式为：第一，非典型的古典增长模式：直接的政府干预和市场协调形成混合经济，推动生产供给主导的工业化规模扩张，快速的资本积累以消费压抑为代价。第二，非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运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较高的消费倾向和公共支出增加，它们共同决定了较大的投资乘数，但在消费受到抑制的条件下，中国不得不通过增加外向依赖运作经济。作为诸多工业化模式中更加具有外生性、外向性和干预性的一种，中国把剩余劳动力这种潜在储蓄顺利转换成快速资本积累，工业化绩效引人注目。

但是，鉴于中国传统结构主义自身的组织局限，工业化仅仅是工业化。就像工业化结束时期其他追赶国家发生的制度硬化症状那样，中国转型时期同样面临着工业化组织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政府干预所形成的资本组织方式及其分割，扭曲了资本资源配置，国有经济资本效率低下、民营经济资本效率潜力压抑的态势扭转缓慢。第二，国外资本日益偏离效率改进路径，外资在制造业的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且日益倾向于房地产投资。对严重依赖外资出口

拉动和经济绩效提高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无疑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第三，工业化时期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城市化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和内生动力建设的要求相悖。

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组织弹性和适应性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作为经济组织弹性增强的突破口，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是合适的选择。就像工业化时期动员剩余劳动力这种潜在储蓄那样，城市化时期的经济组织弹性是另一种有待动员的潜在储蓄。把潜在变现的可行途径是建立政府—企业—教育一体化协同，这是一种强调以知识过程构造保证转型成功的视角。

## 二、要素、组织与转型的一般分析

围绕欠发达经济体工业化推进和贫困陷阱突破，传统发展理论把关注重心放在国家计划下的经济要素动员方面，基本假设是，政府干预对于快速资本积累及相应规模效率的实现是有效的，这种经济绩效的积极追求导致工业化阶段的结构加速。然而，当大规模工业化过程接近尾声，以下两个趋势的叠加将导致结构性减速——工业化向城市化的演替以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提升，此时，工业化主导的增长逐渐朝消费和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转换。因此，经济结构服务化下，转型理论的关注重心也逐渐转变为合意的增长速度（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与福利国家建设（人的质量和增长质量的改进）的权衡，资本深化能否持续成为关键。

但是，城市化路径的国际比较显示，欠发达经济体工业化阶段以政府干预促进增长策略，在城市化阶段可能面临着困难。新的假设是，围绕增长质量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城市化过程和经济结构服务

化过程，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阶段那种围绕资本积累建立起来的效率模式。基本推论是，原有工业化组织内部的增量调整，已经不适用于城市化；特别地，必要的经济组织环节变革的缺失，可能导致效率持续改进动力的缺失，诱发转型风险和转型困难。因此，转型的关键在于重建适应于结构服务化条件的制度组织和行为。

#### （一）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效率：传统发展理论的组织与绩效

经由工业化突破贫困陷阱的命题，在传统发展理论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好地理解。作为一种结构化过程，工业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结构化的途径是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组织的实施，把分散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资本积累，以突破低劳动生产率的传统约束，形成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工业化增长路径。经济进步不是自发的，真正需要的，是真实资本大推动的自我增强过程[1]。

传统发展理论注重“一般经济因素”的分析[2]，强调基于国内劳动力要素禀赋和国外技术的经济组织的建立。认识主线是：在过剩劳动力存在和外部技术可获得的前提下，生产技术和产业联系的建立不成问题；欠发达经济体进入工业化轨道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协调和制度效率[3]。这种认识导致了国家计划作用的思考，国家协调抑或市场协调的争论延续至今。Nurkse（1958）[4]的比较分析认为，工业化采取“计划”协调推动、还是采取企业家精神协调推动，取决于特定经济社会的人的质量和和其他初始条件；在西欧工业发达国家，人的质量的主要源泉是中产阶级，但是，这个重要条件往往不存在于欠发达国家，因此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国家扮演了创新者和拓荒者的角色，并逐渐过渡到计划协调和市场协调的混合经济。

这种（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经济组织的有效性的衡量，有一个基本的指标——资本积累增长速度，它决定着工业化路径下规模经济效率状况，并体现为持续的结构加速机制的形成，包括三个方面：（1）国家在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扩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率不再反映加总的个体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只是由政府政策决定。政府通过计划加速资本积累。（2）资本形成呈现波浪式的“跳跃”，无论是工业生产投资还是先行资本，积累的关键门槛突破至关重要。此时，增长路径不是边际的或增量的，而是综合的和结构的。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增长非连续，这个非连续过程以“物质资本”为载体展开。（3）欠发达国家工业化大规模推进本质上属于“古典”增长——资本形成以消费减少为代价，生产与倾向于物质品的消费模式相应，生产创造自身的需求。工业化成功的标志，是物质品大众消费的普遍满足。[4]

值得一提的是，至少在 1980 年代以前，传统发展理论和经济（成功）追赶给人的印象是，工业化生产组织的建立仿佛是一劳永逸的。无论是直接的政府干预还是间接的政策协调，工业化规模经济效率和持续增长绩效，很难让人怀疑资本积累的工业化组织的有效性——包括投融资体制、劳动组织以及技术进步组织，直到这些机制被经济演化力量裹挟到转型时期，并在结构性减速压力下暴露出来多种弊端和局限。

## （二）转型理论

长期增长过程的经济转型，可以从绩效和组织两个角度进行理解：

（1）转型的绩效含义是工业化向城市化的演替以及中等收入水平向

高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就是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根据经济追赶的普遍经验，大规模工业化可以为贫困陷阱突破进而上升到中等收入水平提供充分动力，当大规模工业化过程结束、增长动力交由城市化接替的时候，大多数国家由于经济结构服务化，不能像工业化那样提供足够的效率改进能力，在向高收入阶段提升时发生困难。(2) 经济结构服务化下的经济结构、增长目标与资源动员方式，与工业化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相应的制度组织也会不同，这种意义的转型主要指经济组织变革。如果说工业化组织制度是长期增长第一次跨越的保证的话，那么，城市化时期效率模式的重塑，是实现第二次跨越直至福利国家达成的保障。(3) 服务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状况，成为衡量经济转型的综合性指标，最终体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共同提高和真实国家竞争力的增强。

### 1. 转型理论

传统发展理论把转型看作两种经济状态之间的转换[5]，这种基本认识从绩效和组织方面得到拓展。Kaldor- Dixon & Thirlwall 有关增长的历史性、因果累积和转型分析，在把技术进步、报酬递增和长期增长联系起来的同时，意识到因果累积在突破门槛效应中的重要性，这是转型与增长跨越的理论要点，并且，这种认识因为增长比较中呈现的事实进一步得到强化[6]。第一，与前文关于资本形成呈现波浪式“跳跃”的表述类似，Ozawa (2005) [6]的产业升级雁阵理论认为，(日本的)产业转型和阶段性序贯升级，不仅是加总生产函数的TFP的增进，而且是新产业结构不断更新旧产业结构的过程，是创新累积而非初级生产要素的增量累积，导致产业结构转换的创造性破坏。

第二，影响广泛的中心—外围理论，可以推及到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后无法完成有效率的城市化转型的反思。尤其是面对诸如发展中国家经过一系列阶段性演化可以达到发达水平的线性发展观，拉美学者认为这不符合经济实际，因为欠发达国家（城市化）缺乏根本的效率改进能力[7]。

基于传统理论和国际增长比较，课题组（2016）、袁富华和张平（2016）[8]对转型过程中的非连续和增长跨越问题，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和阐释。基本认识是：作为工业化向城市化演替、以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提升的叠加，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一个效率模式的重塑过程——即，经济结构服务化是根本不同于工业化的增长模式。换言之，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主导的发达城市化经济，是以“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和高消费能力”这个“稳定的效率三角”为特征，这个特征不存在于通常的工业化“古典增长”模式中。

实际上，在向发达城市化阶段的高效率正反馈增长路径演进中，转型的非连续性暴露了工业化制度组织的深层次问题。（在增长条件变化的假设下），既然结构服务化和消费主导之下的城市化是不同于工业化的效率模式，那么，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经济组织问题，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涉及宏观绩效改进的投融资制度、劳动力组织以及创新激励等问题，在转型时期更应该引起重视。

## 2. 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的分析框架

传统工业化理论对于“一般经济因素”的重视，使得宏观层面上的政府干预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具体到经济转型的问题发现，还需要考虑特定的制度因素和约束条件。这样做的时候，也可以说是

把抽象的计划和干预,进一步具体化到特定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组织和协调过程当中。拓展课题组(2015)[9]关于建立在结构上的生产函数,包含制度组织的分析框架由四个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层面构成——若用结构和组织变量替代标准核算方程中的变量  $Y=Af(K, L)$ , 新的增长分析框架变为: K:投融资结构和组织; L:劳动力结构和组织 A; 技术结构和组织; Y: 产业结构(规模或质量)。为便于分析起见,本文考察转型的两种情形,如图 1:(1)顺利实现增长跨越的(顺时针)正反馈。即,从工业化阶段注重规模效率的模式转型到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稳定的效率三角”模式;(2)转型失败的(逆时针)负反馈。当然,这两种转型模式只是一种简化分析,目的是突出长期增长过程中转型非连续及转型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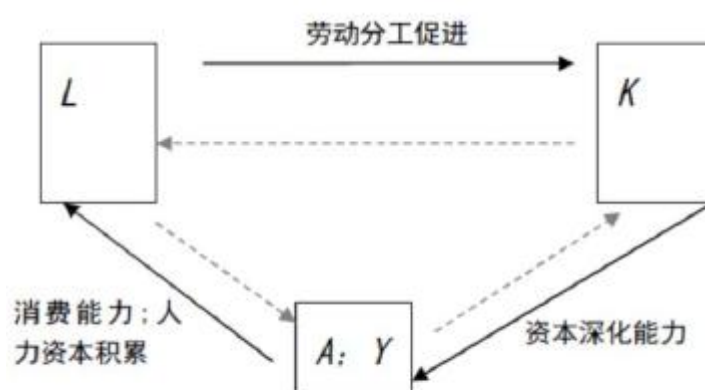


图1 转型分析框架:顺时针的正反馈(增长跨越),逆时针的负反馈(转型失败)

3. 转型、组织与增长门槛立足于图 1 的模型,国家协调和市场协调的混合经济的演化,可以这样进行观察:首先,从追赶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看,政府干预将导致资本组织(K)和劳动力市场(L)的“双重性”或分割,两种分割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绩效表现——创新系统 A 和产业结构 Y,它们反过来又形成对 K 和 L 的反馈。因此,



从组织和绩效综合分析的角度看，资本和劳动组织状况，始终是转型问题的分析核心。这样说的理由是，资本和劳动力组织形式由经济追赶国家特定时期政府干预的不同形式——直接的或间接的——所决定，而转型和城市化阶段效率模式重塑，又直接与制度组织的模式及其变化直接相联系。

一些相关分析案例——如 Parini (2011) [10]的东亚版资本主义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基于间接政府干预和混合经济制度的建立。围绕工业增长优先战略，政府提供适当的政策框架和指导措施，促使私人部门繁荣，这种工业化制度组织的典型特征，在于政府对工业化的引领作用。相应地，转型的关键是通过组织制度变化适应城市化新环境，包括理念、行动和经济运作方式的整体变化。正如 Lechevalier (2014) [11]所指出的那样，日本转型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原有工业化制度组织的改革滞后和反应迟钝，需要更新组织协调方式应对内外部问题的挑战。这种理论思路实际上暗含了增长非连续和门槛跨越的逻辑，也与前文所谓工业化组织并非“一劳永逸”的发展观点不谋而合。转型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组织的问题，在直接的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制度下表现得更加突出，并最终导致资源的行政垄断和部门分割，以及生产/消费诸环节正反馈受阻。

总之，在工业化阶段，直接或间接的政府干预的形式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只要有利于资源动员和规模效率的实现。但是，在以追求增长质量和福利国家建设的转型过程中，直接的政府干预可能构成增长门槛跨越的直接障碍。由此引出下文关于中国经济转型问题和转型方向的具体分析。

### 三、中国工业化：传统结构主义的经济组织及其终结

(一) 传统结构主义增长模式的绩效及其问题从绩效表现看，至少在 2012-2016 年结构性减速出现之前的 30 多年中，中国工业化比较倾向于传统发展理论的设想，这个阶段的结构主义增长方式是非典型古典模式和非典型凯恩斯主义的混合。袁富华和张平(2016)[12]关于中国二次转型的理论分析，把这种混合的特征具体化为：(1) 外向性，即出口导向的增长；(2) 外生性和(负)外部性，即依赖初级要素驱动的增长。这种以生产供给主导的工业化规模经济，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源泉。

#### 1. 非典型的古典增长模式呈现于中国工业化

生产供给主导增长的古典模型：对于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且运用工业化制度组织将其转换为快速资本积累的欠发达国家而言，古典模型的两个假设通常暗含在增长实践和政策措施当中[13]：第一，在真实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需求主要来源于从生产过程自身产生的生产要素收入的循环流转。亦即，迄今未曾使用的资源的动员，经由生产和支出循环流转，扩大了收入源泉，并成为新生产过程供给增加和需求增加的基础。这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生产主导增长的理论内涵。第二，资本积累以消费压抑为代价。尤其是在大规模工业化加速过程中，高储蓄支撑高投资成为实现对发达经济追赶的主要途径，直至基本物质品大众需求得到满足。如果这种依赖物质资本驱动的工业化方式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消费结构升级滞后所导致的对生产的抑制效应就会出现，最终导致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非典型古典的增长成分：这也是传统发展所强调的——政府干预而非自由竞

争，往往充当大规模工业化初期的协调机制，在中国直接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中，这种非典型成分的作用及其后果尤其令人瞩目。

## 2. 非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呈现于中国的工业化

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通过投资需求带动产出增加，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一是国内较高的消费倾向，二是公共支出的增加，它们共同决定了较大的投资乘数<sup>①</sup>。稍微推广一下就是消费能力和资本深化能力一起决定着生产率的提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国家（工业）竞争力研究文献中，有一些争论者坚持国内劳动生产率持续改进和生活水平提高才是主要标志，其他绩效指标如出口等还在其次<sup>②</sup>。非典型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成分：从需求角度理解增长绩效，Ozawa（2007）[14]把日本大规模工业化称为“贫血经济”——过多依赖出口而非国内消费支出拉动，即通过贸易扩张弥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对于中国来说，受过剩劳动力规模效应的影响，这种非典型的凯恩斯增长成分更加显著，增长的外向性和外生性色彩更加浓厚。1990年代中国迈入重化工业化的增长轨道之后，巨大的资本积累一方面压制了消费倾向的提高，另一方面，资本效率迅速下降，并进一步引致如下经济现象的发生：低消费能力与低资本深化能力的负反馈发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实体资金被迫分流到房地产业，促使泡沫膨胀。

## 3. 边界约束和效率问题：传统结构主义对经济的扭曲

因此，我们可以从绩效角度，给出图 1（内部）负反馈情景及其后果的分析：负反馈发生背景是，外向的生产供给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以及国内消费主导的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形成；发生条件是，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导致生产扩张边界约束出现，这也是我们前期一系

列研究所强调的。

(1) 产业结构扭曲和资本低效率陷阱。从产业结构雁阵升级模式看,重化工业引领的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紧接着是以零部件和复杂装配为支撑的深加工度引领增长的发生,这个过程伴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和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换言之,伴随着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演替,以大众基本物质品需求满足为目标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转向以消费者(挑剔)品味满足为目标的高质量物品服务的生产,且日益成为发达经济的标志。偏离这个有效率的梯度演进路径,意味着资本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难以实现知识技术密集方向上的突破,结果是:国内外市场需求的饱和导致制造业资本收益递减的负反馈发生;资金流向房地产(或股票)市场,促进经济泡沫的形成,这是大规模工业化结束普遍呈现的现象。(2) 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及其边界约束。在投资/消费策略权衡上,中国传统结构主义工业化的古典特征以及凯恩斯主义的片面运用,不仅导致了国内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而且阻滞了国内消费能力与资本深化能力正反馈机制的形成。最终,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及其对生产效率改进的约束边界出现,生产供给被局限在标准化工业品上,以质量提升为标志的内生动力无法形成,这是转型时期的主要困难,也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下消费效率补偿机制建立的关键所在[8]。(3)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转型时期中国出口增速的下降及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暗示着以往通过出口扩张抵消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增长方式正在受到挑战。如果把这样的生产方式强行移植到城市化过程,就会发现以往高物质资本积累和高出口规模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而且,如果一味进行资本增量扩张,

消费结构升级也将继续处于抑制状态，根本无法达成内需拉动（内生动力）的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实际上，我们的前期研究多次提出，中国现阶段以初等和中等教育程度为主的劳动力素质状况，已经不适用于城市化良性运作的要求，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成为转型的关键瓶颈。

## （二）传统结构主义增长模式的经济组织及其扭曲

传统结构主义扭曲经济的上述表现，源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经济组织的调整滞后，发展为转型时期的“制度硬化症”和“政府干预失败”[14][15]：典型如日本的情景，经济政策对可贸易私有部门（制造业）的支持促使出口增加，政府对不可贸易部门（服务业）的保护阻碍进口扩大，贸易顺差持续累积并加剧日元升值和成本上升螺旋，最终导致高效率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和国内产业“空心化”；同时，受保护的服务业部门由于缺乏竞争，效率改进缓慢，这种制度组织“双重性”导致了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经济长期低迷。

与日本间接干预、知识技术增量创新、抑制内向 FDI 以培育国内民营企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路径不同，中国工业化制度组织主要围绕政府直接干预、初级要素使用和内向 FDI 建立起来（增长的初始条件使其成为近乎唯一的选择）。为了动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促成这种潜在储蓄向真实国民收入的转化，中国以投融资直接干预为支点，迅速建立起工业化阶段高增长的两种适应性组织：（1）资本动员方式及其功能性分割。国有控股企业：其作用是推进重化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基础的建立，包括基础性工业体系的构建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立，时至今日，随着城市化比重超过 50%，这个历时

使命基本完成。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其功能是弥补国内技术不足，动员国内出口能力，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传统外资使用方式正在日益扭曲中国经济；其他经济（民营经济）：起初的发展是为了填补市场空隙，转型时期已经成长为出口和效率改进的主要源泉。（2）劳动力动员方式及其功能性分割。改革开放以来内部劳动力和外围劳动力的分割，是为了保证重化工业化和低成本增长模式的发展，内部劳动力价格由国家控制，外围劳动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一方面，直接由市场机制进行协调的外围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和中小企业就业者），由于缺失组织谈判环节的支持，是转型时期最需要给予政策保护的部分；另一方面，占劳动力比重不足 10%的劳动者就职于行政事业和其他行政垄断部门，这些人大多拥有较好的教育或家庭背景，工资福利有相对稳定的保障，职业晋升路径较为清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于中国整体经济造成了扭曲，高素质的劳动力被保护在了非生产性或效率改进潜力较小的非生产部门或非市场竞争部门当中了，造成人力资本错配的扭曲。

### 1. 近十年来中国资本的功能性分割及其扭曲

用表 1 中四个区域的数据进行说明。第一，总体来看，国有经济控制资本配置的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从固定资产原值比重来看，2000-2011 年这段时期里，尽管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比重从约 73%下降到约 50%，但是考虑到国有经济力量主要分布在重化工业部门且不以吸收就业为主要目的，因此它将直接决定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效率改进潜力。由于资本深化而非就业吸收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典

型特征，因此，资本效率改进趋势更加适宜于描述其发展状况。

表1 规模以上各类工业企业绩效比较

<b>固定资产原值 比重：%</b>	2000	2003	2005	2007	2011
国有控股	72.9	66	58.3	55.4	48.1
外商	9.5	11.8	14.9	16.1	14
港澳台商	8.7	8.9	9	8.8	7.8
民营经济	8.9	13.3	17.8	19.7	30.1
<b>资本生产率</b>	2000	2003	2005	2007	2011
国有控股	0.24	0.27	0.33	0.36	0.4
外商	0.42	0.5	0.58	0.64	0.64
港澳台商	0.43	0.56	0.61	0.65	0.68
民营经济	0.76	0.85	0.93	1.17	0.98
<b>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b>	2000	2003	2005	2007	2011
国有控股	4.6	8.7	14.5	22.9	40.7
外商	9	12.4	13.6	16.8	25.2
港澳台商	5.8	6.7	7.9	10.1	17.1
民营经济	3.3	5	7.9	12	24.1
<b>人均资本： (万元/人)</b>	2000	2003	2005	2007	2011
国有控股	19.1	32.2	44.5	63.2	103
外商	21.1	22.3	22.4	25.7	39.5
港澳台商	13.7	13.4	13.7	15.8	25.1
民营经济	4.4	5.8	8.5	10.3	24.5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表1 资本效率的对比表明，2000-2011 年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人均资本从相当于全行业的 1.4 倍，上升到 2.4 倍。然而，伴随快速资本深化的，是资本生产率的快速下降，由 2000 年相当于全行业的 0.75 倍下降到 2011 年的 0.63 倍。十年间，国有经济自身资本效率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一直在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制经济资本效率的状态下运营，表现出资本配置的相对无效率。第二，受国有经济资本

集中的影响，作为就业吸收主渠道和效率改进源泉的国内民营经济，资本深化趋势存在但是进展缓慢。2011年，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比重虽然达到30%，但是人均资本只相当于国有经济的1/4倍，比较起来，民营经济资本生产率是国有经济的2.5倍，且较之于其他形式的经济高出50%，这些数据都给为何要给予民营经济充分的政策支持提供了依据。第三，最近十年发生在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中的一个引人瞩目的趋势是，相对于规模以上工业的人均资本平均水平而言，这类企业存在资本浅化趋势，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显示了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目的，依然是追求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从而固化了国内不利于内生动力建立的贸易结构；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在中国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外商投资扭曲中国经济结构的趋势日益明显，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

## 2. 国外资本对中国经济扭曲的具体说明

21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从出口缴货值的分布来看，占固定资产原值比重20%左右的港澳台和外资工业企业，提供了60%-70%的出口；民营经济自2005年以来对出口的提供显著增加，由18%的出口比重提高到2014年的27%。联系上文关于非国有经济资本深化能力不足的问题，可以认为，转型时期中国的出口结构依然以初级加工为主，这种状况一方面由国内重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由外资左右的格局正在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资本浅化，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改进能力，这与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极力追求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大趋势相背离。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日益从整体上扭曲中国经济——不仅仅是工业的资本浅化。表 2 数据显示，2005 以来，中国的内向 FDI 出现显著的“离制造业”趋势，FDI 中制造业投资比重由 70%降低到 2013 年的 40%以下，而房地产业 FDI 投资比重由 9%上升到 24.5%。

表2 外商直接投资(FDI)行业分布及其变化

(单位:%)

年份	2005	2009	2013
<b>总计</b>	<b>100</b>	<b>100</b>	<b>100</b>
<b>农、林、牧、渔业</b>	<b>1.2</b>	<b>1.6</b>	<b>1.5</b>
<b>制造业</b>	<b>70.4</b>	<b>51.9</b>	<b>38.7</b>
其中：1. 纺织业	3.5	1.5	1
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4.7	4.4	3.3
3. 医药制造业	0.9	1	0.9
4. 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6.6	6.2	6
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12.8	8	5.4
<b>5类制造业小计：</b>	<b>28.4</b>	<b>21.2</b>	<b>16.7</b>
<b>房地产业</b>	<b>9</b>	<b>18.7</b>	<b>24.5</b>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	2.8	3.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7	2.5	2.4
批发和零售业	1.7	6	9.8
科学技术、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8	2.5	3.2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 3. 劳动力市场组织及其扭曲

上述各类经济形式不仅决定了中国资本结构，而且同时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总体来看，以国有经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相对高工资、高福利和稳定职业晋升路线为对比，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构成外围，占就业绝大部分比例的这部分劳动力基本上受市场供求力量左右，这种分割群体的特点是相对低工资、波动的就业机会和群体内部较大的流动性。但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围劳动力市场之间，几

乎不存在向上的流动性。毋庸讳言转型时期存在这种问题的客观性。作为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政府干预和经济分割的产物，外围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源于两个推动因素：一是国内劳动密集型民营部门的发展，最初是为了填补短缺经济下国有经济无法满足的市场需求缝隙，尽管这个缝隙随着消费需求的扩大不断扩大；二是国际资本力量寻求低成本而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雇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服务业中民营经济的工资率大约相当于平均水平的 70%，问题在于这种差距发生在中国中等收入水平上，考虑到向城市化转型时期高质量增长的要求和内生机制培育的必要性，外围劳动力群体的这种经济状况，几乎不可能提升增长模式重塑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 （三）工业化仅仅是工业化：增长门槛和负反馈

工业化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亦即，多种多样的工业化组织方式——与特定经济体的初始条件密切相关，是为了解决大众基本物质品需求满足的发展问题，而非解决质量和消费多样化需求满足的问题。工业化仅仅是工业化这样的断语，也是立足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组织变化和重塑的角度做出的。前文所述中国工业化的双重性和结构扭曲问题，可以归结为由于资源配置扭曲而导致的“逆生产率（counter-productivity）”现象，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中指出的消费结构逆城市化现象<sup>①</sup>。至此，我们可以对图 1 的负反馈给出一些结论性说明：转型时期工业化制度组织的逆生产率和消费结构的逆城市化现象，是资本深化能力和消费能力协同演化机制受阻的表现，结果将是转型过渡时期工业化规模效率模式向静态的租金抽取模式

的退化。政府干预所导致的经济组织分割，存在路径依赖问题。尤其是存在垄断利益的情况下，不均衡的资本资源分配很容易被低效率增长路径锁定。就中国现阶段的转型困难而言，国际垄断资本力量的进入会进一步加剧效率扭曲，精英集团和全社会利益冲突日益集中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围劳动力的分割和向上的流动缺乏上。在因为消费结构升级缓慢而导致高层次人力资本比重低下和经济内生动力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受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外围劳动力将变为租金抽取的源泉，遏制城市化的可持续性。拉美国家长期的增长徘徊——尤其是步入城市化阶段之后“，制度硬化症”所导致的经济分割并最终失去内生动力的事实，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非连续提供了鲜明例子。

#### **四、全有抑或全无：创新系统转型与制度组织变革**

从工业化制度安排在转型时期负反馈的发生——以及它仅仅作作为发展阶段促进装置——这一点上来看，城市化阶段的效率模式重塑，所强调的自然是与投融资组织形式、劳动力组织形式以及国家创新组织形式有关的制度变革。这一变革趋势及要点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给出分析，为契合本文主旨，我们只就工业化规模效率模式结束后，为了避免静态的租金抽取困境发生，理论和政策应该着重探索的与创新组织有关的一些问题。

就像传统发展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以突破发展瓶颈那样，城市化接替工业化成为实现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同样需要突破关键性临界条件的约束。这种时隐时现于发展理论中的门槛效应，实际上被“全有全无法则”所主导，认识到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个为生物学家所推崇的法则的含义是：

（一些实验对象如肌纤维、神经纤维对于）刺激只能产生响应或不响应两种反应，响应的程度并不随刺激的增强或减弱而发生改变，即：只有刺激发生在门槛值以上时才引起响应，并且，响应程度依赖于刺激频率而非刺激强度<sup>①</sup>。把“全有全无法则”应用于转型时期工业化经济组织的硬化症时，这样的理解是合乎情理的，即：由于内部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以大众基本物质品需求满足为指向的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形式，已经失去了弹性。一般认为，在转型时期，重塑经济组织弹性至关重要，内生动力的培育和国际竞争力只是经济组织弹性和适应性的结果，这是“全有”的基本经济含义。

#### （一）负反馈和全无

城市化紧接着工业化促进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阶段高收入水平提升，是一种理想的线性思维。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的转型都必须面对二选一的选择：要么立足于国内自身城市化的创新潜力，削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参与分享经济一体化的利益，从而做到经济组织弹性适应和内生效率意义上的“全有”；要么以僵化的工业化时期的政府干预和分割体制，尽力维持初级要素驱动增长战略，但最终趋于国际竞争优势上的“全无”——国内稳定增长受到动摇并将自己置于国际资本和创新的冲击之下。（拉美的例子足可以为“全无”的情景作注解了）。

中国转型时期组织和绩效的负反馈倾向，是资本和初级要素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工业化经济组织诸多方式的一种，中国根据自己的初始条件，在将剩余劳动力这种潜在储蓄转变为迅速扩大的资本积累和高增长基础上，实现了贫

困陷阱突破并把经济推进到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城市化对工业化的接替和向发达阶段的进一步演进，不是技术意义上的边际改善问题。在日益开放的条件下，原有模式的边际改善正在遇到全球化力量的阻力：一是，中国国内成本的上升要求制造业自身具有效率持续改进的能力，不然将会面临消失和空心化的风险；二是，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侵蚀中国在国际分工上的低端产业链条，这两方面意味着以往低成本工业化模式的终结。再者，金融主导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技术力量，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组织的弹性和适应性（以实现竞争优势）成为关键。

在中国传统结构主义下使用力度强大的刺激政策，并没有导致可持续的效率改进这种“全有”现象的发生，相反，强度不断增加的刺激反而导致了制造业资本效率下降和资本向房地产市场的转移，原有模式下的资本再配置进一步侵削了消费结构升级的潜力，把经济一步步压向“全无”的静态租金抽取路径。

## （二）城市化阶段的制度组织弹性和正反馈

从经济绩效持续改进的角度来看，在应对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竞争面前，大国一方面应该提升制造业能力以尽力维持自己的技术创新基础（以避免被国际资本分而治之）；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赋予了城市化新的内涵，即通过服务业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实现经济收益的内部化，并因此尽力构造国内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这是创新外溢性的必要条件。“高劳动生产率、高增本深化能力和高消费能力”效率稳定三角的达成与否，成为制度组织是否具备弹性的衡量标准。大国效率模式重塑的典型例子是日本。直到 1990 年代泡沫发生后，日本才真

正开始了国内经济组织面对外部冲击是否具备弹性和适应性的反思，时至今日，政治博弈和理论探索的直接指向，均是在政府协调和市场协调上寻求一种适合于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平衡。从二十多年的改革效果——尤其是受保护的“内部依赖部门”（如服务业、农业等[14]）放松管制、创新系统（国家—大学—企业）改革——来看，日本的成效是很明显的。

收益内部化作为衡量制度组织弹性和适应性的指标，在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更为重要。就中国现实而言，传统结构主义隐含了这样的假设，即工业化组织重心在于物质技术基础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相应集中于促进生产供给和发展，这个阶段，内部化主要表现为大众基本物质需求的普遍满足。但是，这种内部化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市场分割基础上的短期收益，将会随着剩余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出现而受到约束。城市化经济组织的重心，在于社会基础的建立和完善：内部化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政府干预的重心集中于弱势群体保护、缓解不安全压力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内部化与内生动力的发生相互促进。

正反馈的实现途径和制度组织。上文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分析揭示，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的转型时期，经济效率改进的困难同时发生在外向部门和内部依赖部门。这里首先给出外向部门的正反馈机制的建立的方向。由于采取了主动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战略，中国出口的 60%以上由港澳台和外资承担，这些境外资本的目的在于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尤其是发达国家 FDI，部分动机是以中国便宜生产为基础的再进口。这与发达国家利用外资以促进竞争和创新能力提升

的策略完全不同。同时，传统结构主义对资本配置方式的扭曲，也极大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潜力。在外资不大可能为中国提供创新支持（目的是低成本利用）、国有经济创新动力不足、以及民营部门创新受到抑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在转型时期面临着比任何新兴工业化国家都要严重的模式重塑困难。因此，打破这一困局的可行路径之一，就是在资金、研发和人力资源上给予民营企业支持。如果说过剩劳动力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的潜在储蓄的话，那么，民营企业效率和活力也将成为城市化阶段有待发掘的潜在储蓄。由此，我们得出加强中国经济组织弹性以突破制度硬化症的第一个关键环节。

### （三）创新系统组织与“政府—民营部门—教育部门”的协同

正如理论所普遍认同的那样，全球化既作为一种资本和技术力量、也作为一种外部制度和规则存在。在这种逻辑下，民营部门的潜力正在于它越来越成为联系国际化和城市化的富有弹性的组织。同时，随着资本技术、资本与知识过程一体化趋势的增强，经济组织的弹性和适应性也是创新和消费多样化趋势的根本。由此，我们纳入突破制度僵化门槛的第二个关键环节：创新系统组织，核心环节是政府—企业部门—教育部门的三方协作。

教育这种内部依赖部门的特殊性，在于它承担了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过程循环的关键职能，是城市化时期内部化动力的源泉。分为两个层次：（1）与人力资本梯度跃迁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包括熟练技术教育培训）的发展，这是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及相应基本物质品需求满足之后，居民需求结构发生向科教文卫消费的升级的结果，我们前期研究中所谓消费的效率补偿效应，即是指的这种趋势。因此，城市

化时期存在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再平衡，也就是说存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内生机制对物质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的替换。(2)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依托的知识生产和分配，是一个重新发现规模报酬机会的过程。围绕生活质量（健康、环境）建立起来的高效率服务业的分工发展，既是教育部门功能升级的结果，反过来也会促进与消费高级化有关的技术创新，这是效率稳定三角的动态体现。

城市化阶段教育部门在经济内部化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即内部化经济收益，把储蓄和投资向人力资本提升倾斜，同样需要增强其制度安排的组织弹性，这种弹性主要体现在其与政府和企业的协调之中。原因是：中国国家创新系统有两个短板需要补充：一是企业生产过程中自主的增量创新能力，由于原有工业化模式的要素密集路径依赖，加之外资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分而治之”的做法，极大抑制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二是，面对全球化技术知识竞争，中国的基础性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也正在面临挑战，这个领域中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在国内，构建大学-政府-企业协作平台；在国际上，以企业自身技术实力为依托，形成科技研发联盟。因此，只有经济组织的弹性，才可能接近“全有”。

## 五、结论

中国的低成本工业化扩张路径，由过剩劳动力这个初始条件所决定、并一步被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锁定。在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转型时期，这种以分割为特征的经济组织与服务业发展和创新要求存在冲突，大转型的基本含义就是制度组织弹性的塑造。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中国大转型发生在城市化接替工业化成为主导动力、



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效率扭曲和外围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需要通过城市化进行解决。初级要素使用的工业化战略的长期推行，造成了国内技术的对外过度依赖，全球化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也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自身的技术基础，即使在发达国家，这也是受到极大关注的议题。第二，国际工业化成败经验显示，工业化向城市化的大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全有全无”的问题，无论是国内生产消费矛盾的解决还是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都需要经济组织弹性的增强，不纾解工业化组织的硬化症，面对转型时期的困难将无所适从。第三，这是我们一贯强调的，应对国内外各种问题和困难的根本立足点，还在于中国自身经济绩效的持续改进，依托城市化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的内部化，特别应该重视知识过程的建立。

#### [参考文献]

[1] Bass H H. Nurse's Development Theory: Influences and Perceptions[C]// Kattel R, Kregel J A and Reinert E S. Ragnar Nurkse (1907-2007):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its Relevance for Today. London and NewYork:Anthem Press, 2009: ch9.

[2] Patrick H T and Rosovsky H. Asia's New Giant: How the Japanese Economy Works[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10, 2.

[3] Datta-chaudhuri M. Market Failure and Government Failure[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0, 4(3): 25-39. Hoff K. Beyond Rosenstain-Rodan: The Modern Theory of Cordination Problems in Development[C].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145-188.

[4] Nurkse R.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ment Countrie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8: 12, 16-17, 38, 72, 143, 152.

[5] Hicks J R. Capital and Growth[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6] Ozawa T.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M].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ch1, ch4.

[7] ECL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1949[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1951. Furtado C.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e: The Fundamental Connection[C]. Centr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74.

[8]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北京:经济研究, 2016, (10).

袁富华, 张平. 中等收入阶段的增长停滞与增长跨越:兼论中国结构调整方向[J].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 (5).

[9]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 北京:经济研究, 2015, (11).

[10] Parnini S 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Governance, 2011, 1(1): 197-218.

[11] Lechevalier 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Capit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2] 袁富华, 张平. 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理论分析[J]. 北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6(2).

[13] 汉森. 凯恩斯学说指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11, 135, 第四章.

[14] Ozawa T. Institutionally Driven Growth and Stagnation-and Struggle for Reform[C]// Bailey D, Coffey D and Tomlinson P. Crisis or Recovery in Japa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 ch6.

[15] Ozawa T. 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the “Japanese Disease” : The Conundrum of Manage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6, 30(10): 103-113.

[16] Katz R.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c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M]. London: M. E. Sharpe, 1998.

[17] 袁富华. 供给主导转向消费需求主导: 长期增长过程的调整与效率模式取向[J]. 广东: 学术研究, 2016, (10).

[18] 詹姆斯·卡拉特. 生物心理学[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45.

[19] Kriesler P. Harcourt, Hicks and Lowe: Incompatible Bedfellows?[C]// Sardonì C and Kriesler P. Themes in Political Economy: Essays in Honour of Geoff Harcourt. London: Routledge, 1999: 400-417.

[20] Setterfield M. History versus Equilibrium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3(21).

# **Gr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the End of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rientation of Service-oriented Economic Structure**

YUAN Fuhua ZHANG Ping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slow-dow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marked the end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primary element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urbanization gradually becomes major drives for growth and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deepening, the key for a grand transformation is to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of the Chinese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and to face up to the outside impact. From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e can see that major trans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ization to urbanization is constricted by the capacity of innov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y. As a result, reshape the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of economy to realize endogenesis of growth and internalization of benefit is the fundamental pillar to cope with various difficulties.

**Key Words:** the Grand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m, Urbanization,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of Economy